

和平與安全專題

王崑義 /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主辦單位邀請我來講授「和平與安全」這門課程，過去我們都是談「戰爭與和平」，同樣的主題現在卻變成「和平與安全」，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性？今天課程的主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和平與安全的概念」；第二部分則從實務的觀點切入，談論「台灣與全球戰略」；第三部分為「綜合討論」。

任何國家想要維持和平，主要是以實力對實力作基礎，這並非是對抗的意思，而是一個現實狀況的反映。美國國際關係學界，有人提出現實主義的理論，他們認為「權力（power）等於利益（interest）」，亦即國家有多少權力就有多少利益。譬如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伊拉克想要和平，美國也要和平，可是兩者對和平的解讀並不相同，由於伊拉克的整體國力不如美國，美國不需考慮太多，只要打勝仗就有和平，而不是伊拉克海珊政權所想要的和平。同樣的情形，如果把對象換成是北韓，美國敢不敢也對北韓發動攻擊？因為北韓擁有核子武器，美國一旦攻打北韓，不曉得要損失多少人員與武力，美國必須謹慎思考有無需要對北韓開戰，所以一個冷和的狀態也就維持下來。我再問各位，美國敢不敢隨便對中國發動攻擊，我想美國是不敢隨便這樣做的，為什麼？中國所擁有的核子武器比北韓更多，國力也遠大

於北韓，我想美國在攻擊中國之前，一定會做出審慎的評估。從上述的例子可以得知，現實主義者強調，國際社會中國家要有實力，唯有實力才能講求原則，唯有實力才有和平。

壹、和平與和平的研究

「和平」是國際關係或者世界政治的一個基本概念。在國際法上，和平是國家間關係的一個積極價值，即國際法建立的一個基本假定。與和平相對立的是暴力、衝突和戰爭，在消極的意義上，和平就是戰爭的間歇或者沒有戰爭的狀態，由於戰爭不是打一場就結束，而是一個群組串連在一起，才稱之為「戰爭」。像美國這次攻打伊拉克，其實三十天就可以決定勝負了，但是直到今（2004）年6月份美國才把政權移交出去。因此，美伊戰爭的開始是從布希對伊拉克發出最後通牒，第一個飛彈打出去時，戰爭就已經開始，而什麼時候戰爭才算結束？到現在還不知道。1982年以前，美國並不把恐怖主義視為戰爭，而從1982年以後，美國才把恐怖行動也視為戰爭。美國把恐怖行動視為戰爭的原因，主要是1982年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一件是在黎巴嫩（Lebanon）的首府貝魯特（Beirut）發生，當時有一個阿拉伯人駕駛一輛載滿炸藥的大卡車，衝向美

軍陸戰隊的陣營裡，炸死了二百四十個美軍陸戰隊隊員；同一時間，也有一輛卡車衝撞法國和平部隊的所在地，死了五十八個法國士兵。從此以後，美國就認定所有的恐怖暴力都視為戰爭的行為。從1982年以來至今，人類好像沒有和平過，因為每一個爆炸案發生之後，接下來就有戰爭的發生。既然戰爭是一個群組串連在一起，從1982年到現在已經經過很多年，恐怖攻擊行動沒有結束過，人類社會是否一直都在戰爭中？其實，判定人類社會是否一直都有戰爭，是一件很難的事，按照國際關係理論對和平的解釋，戰爭與戰爭之間沒有發生戰爭的狀況時，就稱為和平，所以嚴格來講，人類社會是處於和平的狀態，而不可能隨時都在戰爭。

很多人都覺得戰略很可怕，認為戰略就是拿槍去衝鋒陷陣，其實真正學戰略的人是不需要拿槍作戰，真正拿槍的人是不學戰略的。國內研究戰略的單位只有二個：一個是國防大學的戰略所，另一個則是淡江大學戰略所，唯有這二個系所的學歷，可以承認其具備戰略的資歷，其他系所則不行，包括政大外交系、台大政治系都不行。因為戰略是教我們不要拿槍，而可以用腦袋打贏戰爭，譬如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就提出「隆中對」——簡單說，諸葛亮會見劉備綜論天下大勢與如何三分天下的談話。當時劉備在荊州一帶找不到地盤，諸葛亮告訴劉備，唯有往西蜀佔有蜀地後，再向南蠻擴展，就可以形成三國對立的局勢。諸葛亮向劉備所提的「隆中對」這種三分天下的策略，不用拿刀劍，也不需騎馬打仗，劉備自然可以跟關公、張飛一起打出天下，將諸葛亮的概念實現，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戰略家。

我們理解「戰爭」及「和平」的用意，因為不瞭解戰爭，就無法瞭解和平的意義。因此就消極的意義而言，和平就是一個戰爭的間歇，或者沒有戰爭的狀態；在國際法上，和平是國家之間一個比較積極的價值，即國際法建立的一個基本假定，亦即如果只把和平當成是一個狀態——也就是戰爭與戰爭之中，沒有戰爭的時候才叫和平。譬如你遇到一位你很喜歡的女生，然後開始進入戀愛狀態，叫做暗戀，而當你發現這位女生將變成你生命中，最高、最積極的價值，開始採取行動時，這就變成一個價值。因此，要有行動，把它變成一個最高境界，而不是一個狀態，就是一個價值。如果僅是幻想這位女生是你的夢中情人，這只是一個狀態，是沒有什麼意義；但當你發覺她是人生最高價值時，然後開始去追求她，你的愛情變成一個價值，就會變成你生命中的動力，同樣地，我們要去追求和平的價值時，就會有一股很強的動力產生，推動我們去促進和平。

和平是人們有史以來，一個根深蒂固的信仰。不論是敬拜釋迦牟尼、或是接受耶穌得永生的觀念，或是祈求人類和平，這些都是一種信仰。所有教宗一開始即是祈求人類和平，因為它是一種信仰。愛好和平是人的基本本性，追求和平也是一些人的事業。和平也是一些人希望的國家間關係，一種可接受的消極狀態，儘管其中存在著分歧和衝突，但人們的理性認為，戰爭不能作為對外政策的工具。這一個觀點在核子武器出現之後更是如此，使得各方面分歧與衝突很大的國家之間，不得不和平共處。這個意思是說，大家在講求和平，但戰爭是否可以達到和平的目的？過

去認為是不可能的，可是當核子武器出現之後，人們才發覺和平必須在戰爭的狀態之下，才能達到和平。美國有一位國際關係學者，提出核子時代的和平，來自於因為自己本身有核子武器，譬如美國有核武、蘇聯也有核武，在彼此相互保證毀滅之下，雙方都不動用核子武器，而造成冷戰（cold war）或「冷和」（cold peace）。因此，人類才有和平，此時戰爭變成一種達到和平的工具。

或許有人會問說，台灣和大陸的情況，是否可以用戰爭來達到和平的目的？事實上，要用戰爭來達到和平的目的，首要的前提是要有核子武器，而台灣並沒有核子武器，我並非鼓勵台灣發展核子武器，台灣雖然沒有核子武器，但是還有一種武器就是「意志」（will）——生存的意志、保國衛民的意志。台灣如果沒有意志，又沒有核子武器，中國大概只要打一下飛彈，我們就束手投降。

1996年台灣在總統大選時，中國飛彈試射威脅之下，為什麼沒有投降？因為我們有生存的意志，維護自己生活方式、民主生活方式的一種生存意志。這跟核子武器的力量一樣，可以讓強大的敵國不敢小看我們的存在，如此也能維持和平。從1996年中國試射飛彈，到目前為止快十年，我們就沒有看到中國繼續打飛彈。因為中國也發覺二顆飛彈測試之後，台灣人有死守土地的意志，所以中國越打飛彈，李登輝得到的選票也就愈高，本來得票率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中國打飛彈之後，得票率卻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四。今（2004）年三二〇總統大選時，中國也學乖，不再多說話、也不打飛彈，看看阿扁選票會不會掉下來？結果天佑台灣，阿扁拜票時受到槍

擊，二顆子彈雖小，一個是銅彈、一個是鉛彈，它們的威力和1996年中國試射的兩顆飛彈一樣。總之，意志的存在是不分大小，國家雖小但是人民有生存的意志，足以保衛國家而不受惡霸的欺負。

和平的存在，並不一定把戰爭當成一種促進和平的工具，意志也可以當成促進和平的工具，甚至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一種角力過程，都可能產生和平的狀態。人類社會為什麼這麼複雜，難道不能和平共存，並避免發生任何衝突、戰爭或暴力嗎？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像：這個世界如果能夠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暴力或吵架，會是多美好的世界，但實際的狀態卻不是這樣，因為人類想要維持一個和平，並不是想像要和平，就能夠建立和平的環境。

和平也是一種國際秩序，特別是在國際上有一股受強權主導的力量，譬如歷史上有「羅馬治理下的和平」、「基督教治理下的和平」、「不列顛治理下的和平」，以及「美國治理下的和平」。在這些條件下，顯見和平是指由霸權國家來主導整個國際秩序所造成的秩序狀態。冷戰結束以後，第一個喊出要建立國際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是美國的老布希（George Bush）總統。國際要建立新秩序，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任務，因為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結束，幾乎都是透過戰爭來做終結，像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冷戰開始，可是冷戰結束之後，在沒有戰爭的狀態下，蘇聯共黨政權與柏林圍牆（Berlin Wall）莫名其妙就倒塌了。所以，美國要如何建立新秩序，美國在冷戰結束及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如何展現出主導國際秩序的意願。1990年伊拉克（Iraq）海珊政權送給美國一份禮物，派兵入侵科威特（Kuwait），

美國要求各國派兵組成聯合部隊，發動1991年的「波灣戰爭」(Gulf War)。波灣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喊出要建立全國軍事區，讓老布希有機會在冷戰結束後，整個世界尚在混沌之下，因為波灣戰爭的緣故，促使老布希總統開始計畫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新秩序建立之後，促成柯林頓八年執政達到美國最繁榮的時期。美國因為有這個國際新秩序，才能在冷戰結束之後，成為維持全球秩序的霸主。

美國經過十年的繁榮發展之後，2001年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需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並沒有學習他父親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老布希在1991年波灣戰爭結束之後，立刻推動國際新秩序的行動，雖然老布希總統未能連任美國總統，卻奠定柯林頓執政八年經濟繁榮的基礎。然而，美國小布希總統打完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先打阿富汗，再攻打伊拉克。美國攻打阿富汗使用三十天，獲得一個很好的成果，可是美國攻打伊拉克，卻有許多歐陸國家反對美國的作法，弄得美國灰頭土臉。由此可知，在一個新秩序下，不管是不是受害者，一個霸權要建立新秩序，只能打一場戰爭，並不能連續打兩場戰爭。我認為自古以來，一個霸權不能無限制地消耗自己的資源，也不能把自己的武力無限擴張，因為其他國家擔心一旦霸權國過於強大，將會影響自己國家的利益，因此這些國家會結合在一起，共同對抗霸權國。那麼霸權國要如何主導國際秩序？如果無法主導這個秩序，霸權國又能否維持和平的狀態？對美國小布希總統而言，打仗容易但收拾殘局難，這都會影響到他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是否能連任的

問題。同時，有人會問1991年老布希沒有連任成功，而這次小布希不連任也沒有關係，也許這一次又會幫民主黨建立八年的繁榮時期，在歷史發展上也是很不錯的結果，反正兩代父子都為他後面的世代，建立較好發展的基礎，美國人仍然會感激他們。不過，在此有一個觀點必須注意，美國用霸權的方式來維持世界和平或秩序，就無法隨自己的心意而恣意妄為。譬如一個大男人維持家庭秩序，不能因妻兒的行為不對，就痛打妻兒，到最後可能造成妻兒聯合在一起，把家中大男人驅逐出境。基本上，美國可以殺雞儆猴，但不能一天到晚宰割別人，這就是一個維持霸權秩序的原則。

長久以來，追求和平、維持和平、避免戰爭一直是國際思想或者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導性觀念。實踐和平、維護和平，甚至締造和平都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主導性線索。和平是必須要去追求、實踐，如何追求一個避免戰爭的狀態，才有價值、以及和平秩序的存在。

世界上有各種關於和平的思想，例如德國大哲學家康德(E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Der ewige Friede)論」(1795年)，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關於戰爭的原因，以及維持和平的經典宣言，而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則是納入包括康德等人和平思想作為主體架構。國際間本來是一個無政府狀態，我們如何建立一個國際法的秩序，用法律的秩序來追求人類永久的和平，問題是這個秩序要由誰來主導？如果由霸權來主導的話，則是霸權穩定，像剛才談到的美國式的霸權、英國式的霸

權。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一個世界政府，聯合國就是在這種狀態下成立的，也就是人類不靠強權去追求秩序時，最好是由各國政府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世界政府（聯合國），然後在其主導之下，全球才有辦法維持一個和平狀態。

聯合國成立的宗旨是為了「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參加聯合國的國家都應是「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 Security Council）的任務——對付「對和平的威脅」，可以說「聯合國憲章」是一部關於和平的偉大宣言書。所以1991年時，聯合國成立很多聯合國部隊，處理科索沃（Kosovo）發生的種族淨化、巴爾幹半島（Balkan Peninsula）發生戰亂等影響和平的事端，聯合國就會派出維和部隊去處理。真正感覺聯合國有發揮功能，是在冷戰結束那一段時期，也就是九〇年代，聯合國當時有很多維持和平的部隊可以派到世界各地維持和平，而不是美式主導性的和平。聯合國是各國所組成的，聯合國決定要維持和平，是透過各國協商談判妥協來達到目的。聯合國大會2001年9月7日通過第55/282號決議案，決定從2002年開始，每年9月21日為「國際和平日」。聯合國大會宣佈國際和平日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並邀請所有國家和人民在這一天停止敵對行動。大會也邀請所有會員國、聯合國系統各組織、區域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以適當方式包括通過教育和公眾宣傳慶祝國際和平日，並同聯合國合作實現全球停火。

貳、安全與安全的研究

在國際體系中有關國家間互動關係的呈現，傳統的研究比較著重在衝突的層面，

包括國家與非國家等各種角色的互動關係，這些研究範圍都著重於好比人類在一起就一定要打架，國與國之間非打仗不可的部分，和平反而比較少。事實上，人類除了戰爭之外，還有很多東西是非戰爭層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領域。由於研究領域的擴展，也使得國家安全的研究，變成是國際關係研究上的一門顯學。一般而言，除了應付戰爭，每一個國家都要作好「軍事安全」的準備，此外，土石流對人類生命危害也是一種安全議題，稱為「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安全的概念，來自於從國家間的戰爭，去看和平時期應該如何去維護安全的狀態？換句話說，談安全不是只在戰爭時期才有安全的問題，在非戰爭時期（和平時期）也有各種不同的安全問題必須重視。在各國都把安全的範疇，擴展到非衝突的層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領域。冷戰以後，安全研究演進為強調安定、法律秩序、國家間公平、正義、和平與發展、南北問題；其次，還包括探討人類自然資源的運用，以及環境所出現的問題，提出「人類安全」的觀念，範圍相當廣泛。再者，全球化的現象出現以後，國際經貿的往返，各國受到全球化影響所形成的文化問題，也變成國家安全研究的範疇，九〇年代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Huntington認為，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的對立將從意識形態對抗轉向文化的對抗，而提出伊斯蘭（回教）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扞格不入的說法，認為儒、回聯合對抗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兩者之間形成對抗的關係，直到九一一發生之後，才發覺

回教確實開始對抗美國，包括美式的和平與資本主義。到今年Huntinton又出了一本新書《我們是誰：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目前不是只有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對抗而已，美國內部的族群之間也發生對抗的情形，特別是美裔的拉丁美洲人與原有的白人之間對抗關係，已經勝過於過去黑白之間的衝突。從文化的研究可以處理廣泛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的對抗，也可以是國家內部對抗的關係。國家內部這種文化民族性的事物，使得國家安定及安全變成很重要的觀點，這就是安全研究又繼續擴展的一個首要思考面向。

當前國家安全研究的目標導向：包括強調建立世界新秩序、建立全球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等新的領域、針對全球的暴力團體、恐怖組織，以及弱國的角色，文化衝突等方面的研究。

國際間流行的相關安全觀：

（一）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

「共同安全」一詞首見於1982年「歐洲帕姆委員會」（the Palme Commission）所提出的報告——「共同安全：生存的藍圖」（Common Security: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的用語而來。根據此一報告，「共同安全」的主要內涵有：（1）避免戰爭是共同的責任，是各國之間共同的責任，不要發生戰爭，特別是核武戰爭，因為1982年冷戰還未結束，核子之間的對峙還是很嚴重，基本上維持一個不會發生核武戰爭的狀態，就是一種共同安全。

（2）各國的國家安全及生存是相互依賴的，因為國與國之間的生存具備互賴性，

安全不是一個國家的事務，而是大家共同擁有的。譬如南極的臭氧層破洞，紫外線變強，然後引發聖嬰現象，該熱的時候不熱，該冷的時候不冷，如此一來整個人類都受到共同的影響，生存是一個互賴性的，全球每個國家應該是相互依賴。

（3）核戰的避免全仰賴各國對和平的堅持、國家的自制與降低軍備競賽。意思是維持和平與避免核戰發生，是大家追求或堅持和平的一種意志，才能夠真的避免爆發核武戰爭，否則核戰一爆發，全球可能就遭受毀滅。因此冷戰時期最大的價值，就是如何避免核戰？等到冷戰結束之後，美國開始思考避免核戰最好的方式是什麼？讓自己有一個金鐘罩，就是建立飛彈防禦系統，當敵方發射飛彈攻擊時，美國可以發射愛國者飛彈將它打掉。一般來講，核子飛彈上面裝核子彈頭，必須要予以引爆，裡面的核子裂變才會產生效應，如果把它打掉，核子彈頭沒有引爆而掉入海中就沒有用。飛彈防禦系統就是不要讓飛彈有引爆的機會，這樣就能避免遭受核武攻擊。

另外，歐洲帕姆委員會也列舉六項基本原則：（1）各國主張安全的合法權利；（2）武力不是解決國家爭端的合法手段；（3）國家的政策需以自制為著眼點。何謂自制？就是自我克制，不要懷疑對方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發動戰爭，美國就是犯了這個問題，美國認為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力的武器，非把海珊政權推下台不可，後來才發現找不到之前所提到的這些武器。難道美國的情報網那麼差嗎？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什麼都沒有，要滲透太容易了，怎麼會找不到？美國打完伊拉克之後，發覺伊拉克並沒有大規模殺

傷力的武器，造成各國對美國極不諒解。

(4) 軍事優勢不一定能確保安全；(5) 裁軍與軍備管制是有必要的；(6) 應避免軍事將領被談判與政治事件聯結處理。

此外，共同安全與「防禦性安全」(Defensive Security)及「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精神，尤其是在冷戰時期特別喜歡提到集體安全，其內涵是相近的，希望透過共同的合作途徑，以降低戰爭的可能性，而非採取強硬對抗的軍事同盟，或雙邊的協防條約來阻止戰爭。它所指涉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與敵人合作，強調經濟與安全環境的重要性，並促進各國進行裁軍、軍備管制與推動建立「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等。

(二) 合作性安全 (Cooperative Security) 是加拿大前外長克拉克 (Joe Clark) 在1990年9月聯合國大會中所提出，相對於從「歐洲安全合作會議 (Council of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所衍生的「共同安全」概念，「合作性安全」在推動建構亞太安全保障體系時，更強調在沒有特定藍圖、計畫與組織下，以非正式途徑、彈性漸進及結果取向，逐步地建立架構亞太安保體系。一般而言，「合作性安全」所強調的重點如下：(1) 在形式要求上更寬鬆與彈性，不必然需有聯盟集團的對峙——如集體安全或是以非正式的組織與條約的方式，來確保相互的安全承諾。由於亞太地區國家之間太複雜、民族及各國國家利益也不同，台海兩岸之間、南北韓之間與南海地區等皆存在矛盾，要建立一個聯盟體系像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一樣是很困

難，無法建立一個各國聯盟之間的關係，彼此只能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 進行對話；(2) 在安保機制的啟動時程上，更著重預防危機的出現，而非事後的處理。所以危機預防就變的很重要，當阿扁總統提出制憲公投，美國政府就很緊張，因為預見危機要發生時，就應該處理不要讓它惡化。(3) 不排斥區域內現有的相關安全安排與協定，務實漸進地發展多邊安保機制，設法將區域現有的安全機制整合進新的安保體系中。這是指各國之間有安全的關係，然後逐漸擴展出一個大的安全架構，譬如台海兩岸之間可以建立一個架構，再加上美日之間有美日安保同盟，另外東協之間也有安保架構，最後再把大家的安全架構，納入一個更大的安全架構之中；(4) 尊重國家利益仍為各國的首要考量，不論強弱國都是區域安全的重要成員。當然，合作性安全也和共同安全一樣，都主張必須與潛在的敵人一起合作，來達成安全的目標。此外，兩者也都隱含一些「綜合性安全」的看法，嘗試將安全的定義，擴大到非軍事性層面。不過，軍事問題的協商與合作，依然是合作性安全關注的重點，而從合作性安全理念在亞太地區推動的過程來看，合作性安全與共同安全的最大不同，是對非正式途徑的重視，亦即在強調建立安全對話習慣與管道的核心精神下，只要能促進亞太區域安全體系的穩定發展，任何形式的安排都應積極加以促成。

(三) 綜合性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綜合性安全是由日本首先在七〇年代末所提出，它是從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等層面，整體賦予國家安全較

廣泛的觀點，也較符合東亞國家的需求。對大部分東亞國家而言，歷經殖民統治、美蘇冷戰對抗，與各國內戰等慘痛的歷史經驗，使其在界定國家與區域安全的內涵時，偏重於自身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需求的「綜合性安全」觀念。日本提出「綜合性安全」觀念的目的，主要是因為：（1）為了與擴張主義時期的國家安全概念相區別。所謂擴張主義是指日本二次世界大戰前軍國主義不斷對外擴張，大家害怕日本又談了什麼東亞安全、軍國主義式的安全，因此日本要把它區別開來，強調日本謀求區域的安全，而非戰後軍國主義式的安全；（2）受到日本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因此，日本必須要提出一種新的安全觀；（3）日本是依賴資源進口與出口型導向的國家，經濟安全為首要工作。總言之，日本為了扭轉其在傳統軍事安全的不利地位，凸顯綜合性安全的地位和作用，並淡化各國對其謀求政治和軍事大國所引起的反感。事實上，日本從七〇年代就開始想做世界軍事大國，到目前為止日本一直在謀求東亞地區的大國化。亞洲各國很擔心，日本成為大國之後，軍國主義會不會又死灰復燃？東亞地區到目前為止，比較大的爭執點是日本的大國化、台灣的民主化、大陸的崛起化、兩韓的核武化等。其中日本的大國化、台灣的民主化都屬於政治性，而中國則是想用經濟來詮釋中國的崛起。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國崛起以後，又會對其周圍國家造成威脅。因此，政治的議題挾帶在整個東北亞地區，使得東北亞各國不受政治影響實在很難。所以美國在冷戰之後，把所有重要的核子武器，或是核子潛艇以及轟炸機，全部移到關島，稱之為「戰略東移」。美國以往

是重歐輕亞，而現今則是歐亞平衡，主要是因為目前東亞地區的政治情勢最難解決，隨時都會引爆衝突，反觀歐洲地區則沒有這些問題，這是美國一直在東亞地區做危機預防的主因。

基本上，亞太地區的發展可分為兩個脈絡：一是強調外部取向（outward-looking）的日本；另一則是強調內部取向（inward-looking）的東協國家，兩者分別代表經濟先進國家，以及後進國家所面臨的安全情境及解決方法。簡言之，日本是一個先進發達的國家，必須不斷對外擴張，以因應市場的需求；可是內向型的東協國家才剛崛起，本身要先發展好才能對外擴張。日本的國家安全目標，因國內族群同質性高與政治結構穩定，乃將安全問題凝聚在外在環境的影響，特別是確保日本石油及經貿生命線的安全。相對的，大多數東協國家又因國內種族問題複雜、政治不穩定與社經發展落後、貧富不均，導致各國社會不安，故其安全政策多強調如何發展國內經濟、維護政治與社會安定，以及排解種族紛爭等課題。由此可見，各個不同安全的需求是不一樣，日本是外向型會注重到周邊的環境，以及石油的往返等等，可是內部取向的國家，需要穩定才能發展。另外，就相關安全理念而言，「綜合性安全」對大部分的東亞國家是較具吸引力，因為對缺乏區域安全合作經驗與條件的東亞國家，以強調發展經濟、滿足各國內政治需要的安全理念作訴求，則可增強各國參與建構保障體制的動機之外，也可提升各國安全合作的意願。安全是要合作的，不是自己有安全就能安全，而是跟對方產生合作的關係才有安全，這就是為什麼有合作性安全、共同安

全，甚至綜合性安全等，都是國與國之間講求的區域國家間之安全主張。

（四）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是現在比較流行的概念。因應全球化的發展，安全的範疇已經無法再以傳統軍事面向來思考。1994年聯合國開發總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所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指出「人類安全的幾個基本內涵」——包括：一、人類安全是全球的關切項目。國家不論強弱，人類無論貧富，都受到人類安全的影響。對於人類安全造成威脅的因素來自各方，例如失業、毒品、環境污染、人權破壞等，這些因素可能有地區性的差異，但總體來說，他們對人類安全的威脅正在提升。二、人類安全的組成部分是相互依賴的。當人類安全受到威脅時，所有的國家很可能被牽涉在內，飢荒、疾病、毒品走私、種族衝突，以及社會的動亂不再只是單獨的事件，而是彼此之間有相互影響。三、人類安全經由早期預防比較容易確保。人類安全的問題若能早期預防，花費較少，而且成效更好，以困擾第三世界國家的各種傳染病為例，早期預防通常有較好的結果。四、人類安全是以人為中心，不是以國家為中心。人類安全關切的世界人類如何生存、如何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如何在競爭、衝突與合作的環境之中進行互動和生存。在此大前提之下，人類安全主要是考慮如何免於匱乏，其次是如何免於生活上的種種威脅。

從上述的原則下，人類安全因此可以區分成七大項：

一、經濟安全：包括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經濟穩定問題等。

二、糧食問題：包括去思考全球的糧食，能否養活全世界人口的問題、生產與糧食分配的問題。

三、健康安全：包括疾病、營養、醫療照護等。

四、環境安全：包括森林的過度砍伐、土壤沙漠化與鹽化、酸雨、河川污染、空氣污染、臭氧層破洞等。

五、個人安全：包括人權保護、司法制度是否夠健全、婦女、兒童與弱勢團體的照顧等。

六、社群安全：包括家庭、社群、原住民的福利與保護等。

七、政治安全：人類政治活動是否被干擾、言論、資訊自由權等。

聯合國1994年的報告中，總結人類的威脅有：人口的過度成長、經濟發展的不平均、移民與難民造成的安全威脅、環境污染、毒品走私。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國際恐怖主義的活動也受到關注，為了防止人類安全繼續受到威脅，聯合國希望會員國建立早期的預警制度，在預防外交中加入對於防範人類安全的作法，同時要求各會員國在人類安全方面加強合作，可見人類安全的觀念慢慢被各國所接受。

參、台灣的全球戰略

台灣該如何思考擴張全球戰略架構，並掌握整個安全、和平的環境？按照傳統冷戰時期的圍堵戰略，從美國全球戰略構圖上來看，歐洲、東協與澳洲、日本，是美國圍堵戰略的三個角，其中西半部及東半部的部分，包括以色列對中東，台灣對中國，而右邊這一塊扇形戰略則是美國在冷戰之後，所建構的亞太全球戰略。由此凸

顯台灣的角色，在美國基本戰略構圖的重要性。至於，台灣的全球戰略部分，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構想：

一、李登輝以來的全球戰略構圖

1、李登輝以來的全球戰略構圖：李登輝路線→「南北縱橫」路線→北聯日本，「南向」東協的「雁行發展」（flying geese pattern of development）戰略→連結東北亞與東南亞兩大區域的軸心。

2、許信良的全球戰略構圖：許信良路線→「東西橋樑」路線→「東西橋樑、海陸介面」的「大膽西進」以及後來被轉化為「強本西進」的政策→連結中國與美國東西兩大板塊的核心。

3、陳水扁總統的全球戰略構圖：陳水扁路線→「全球運籌」的概念→結合「南北縱橫」與「東西橋樑」路線→台灣作為連結東北亞 - 東南亞、東西兩大板塊的核心。陳水扁總統的策略，很可惜一直拓展不出去，受到中國一直不給善意的抵制，導致西部這一塊做不了，只好不斷在西、南向發展。

二、三條路線的作為與失敗

1、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圍堵主義、兩國論。失敗之因→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使得南向政策完全中止。

2、許信良→提出大膽西進、三通談判、擱置主權爭議。失敗之因→1996年中國飛彈演習、戒急用忍。

3、陳水扁→提出三個談判架構：包括（1）現實基礎下推動與北京關係正常化；（2）聯合國架構下和平解決兩岸紛爭；（3）不預設未來發展走向。而且還提出新中間路線——「四不一沒有」（不宣佈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路線、不推動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

領、國統會的問題），還有提出統合論、大膽喝茶。但是中國均未給予陳總統善意的一些回應，等到陳水扁總統到8月3日提出「一邊一國」時，中國才知道時機已過。中國自認為大國，所有政策要慢慢來，而我們台灣的政策翻臉就像翻書一般，所以有人說阿扁善變，我認為不是阿扁善變，而是中國根本不瞭解台灣。台灣是個海島型的小國家，與中國比較起來，求生存本來就比較不容易，所以台灣的政策必須隨時轉變，不轉變就跟不上發展步調。反之，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亂變，一變整個國家就會造成動亂。由此可見，台灣與中國的思維，基本上是不一樣。

肆、一邊一國論的戰略構圖

一、一邊一國論推出之因：

1、中國在2002年7月21日陳水扁就任民進黨主席時與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建交，刺激陳水扁說出「要走自己路」的決心。以視訊直播方式於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中致詞。

2、2002年8月3日在東京獨派團體的集會中，陳水扁總統以視訊直播方式於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中致詞，表達台海兩岸是「一邊一國」的主張。這項宣言在國內外的壓力下，改為「主權對等論」。

3、2002年8月24、25兩天所舉行的黨政「大溪會議」，以及9月7、8兩天所舉行的「三芝會議」之後，兩次會議的結論，其實已經為台灣架構出「一邊一國」全新的全球戰略構圖。

二、「一邊一國」的戰略意涵

以「新衝突戰略」重新界定中國的角

色：

1、升高兩岸危機以重新界定中國角色：

根據史蒙克（Richard Smoke）對「升高」（escalation）的概念，所下的定義「升高是明顯的跨越現實有限戰爭的界線，而且發生在行動者不能全然知道其行動後果的系絡中，特別是他的行動和敵對者的潛在反應所可能產生的互動情境，而這種情境誘使新的行動，繼續去跨越明顯的限制。」。簡單而言，所謂升高是指：當我們不知道對方意圖及想法時，與其在那邊僵持，倒不如挑明，將兩者關係升高，然後測試本身的底線在哪裡？只要不爆發到戰爭的階段，都可以解決，這就是升高（escalation）。

因此，「升高」的戰略，主要是立基於決策者的認知與期待之上，從他對極限的認知，對危機結果的期待，以及雙方對目標的看法等，這些因素都造成雙方形成一種互動的關係。這意思是說本身的目標是什麼？忍受的極限是多高？對危機希望造成什麼樣的期待與結果？只好用升高（escalation）去挑高它，這就是戰略。

當我們不瞭解中國現在的狀況，而中國也不瞭解台灣，彼此不瞭解對方時，我們必須界定敵人的危機構圖。因為中國實行戰爭恐怖主義，用飛彈對著台灣，因此我們界定他用武器威脅台灣是一個惡霸，然後再把中國界定清楚，界定的目的就是準備要升高兩岸之間僵持的狀態，希望透過升高來瞭解彼此，然後才能坐下來談判；升高最後的目標還是要談判、協商，因為唯有談判、協商才能理解：

（1）論述方式：陳水扁總統改採新衝突的戰略中，為了展現自己的戰略意志，

不斷宣言中國在對岸部署四百多枚飛彈，以及發展「超限戰」是一種類似「戰爭恐怖主義」，以此作為支撐想像危機的虛擬與真實。

陳水扁總統說：「中國長期構思對台灣施行『超限戰』的策略，企圖在無預警的情況下，以快速的全面攻勢，利用第五縱隊、巡弋飛彈、電磁脈衝彈、生化武器、網路駭客等方式，對我基礎建設、指揮管制系統、政治、經濟、金融中心進行破壞，藉以瓦解我軍民意志。這樣的威脅，本質上與恐怖主義十分類似。」

（2）論述內涵：在這一組論述中所呈現的想像空間，「戰爭恐怖主義」是最外層的虛擬敵人，第二層的中國則是虛擬敵人的具體化身，而中國在對岸部署四百枚鎖定台灣的飛彈，則居於最內層，以支持危機想像的基礎。透過這種敵人的想像建構，重新界定中國的角色，除了對內可以凝聚國內民眾的危機意識之外，對外則期待國際社會，能夠瞭解台灣所面臨的危機情境。換言之，因為外面有一個大的敵人，當我們重新清楚界定敵人，我們內部可以凝聚民心，外界也可以瞭解台灣處於危機之下，爭取各國對台灣的支持。

2、以「新政治經濟戰略」找回台灣的生存空間。

（1）三個支柱：在「大溪會議」結論的第一項中，曾提出「為落實『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經濟戰略，經濟、外交等行政部門應加速推動與我貿易伙伴，包括美國、日本及東協國家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以全面展開對外經貿網絡，深化台灣經濟國際化。」

（2）一個突破點：有關「政府推動兩

岸經貿關係正常化，未受任何影響，行政院應即就如何落實兩岸直航進行評估規劃，俟談判完成，便可付諸實施。」

(3) 扇形戰略架構：扇形戰略是美國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 在1991年10月出版的《外交事務季刊》中，所發表的「美國在亞洲—浮現中的太平洋區域架構」一文中，歸納當時美國的亞太戰略是以美國為中心所輻射出去，從日本 - 南韓 - 菲律賓 - 泰國 - 澳洲成為弧形的「扇形戰略」。在這一戰略架構中，美國把它在亞太地區的經濟伙伴與安全的盟國變成一個利益的整體，並從地緣上對中國形成一個「重點突破」與政經體制「和平演變」的戰略設計。因此，「扇形戰略」的主要假想敵是中國，目的是為了在亞太地區的海洋戰線上，建構一個帶狀區域，以推動中共「和平演變」的「新圍堵戰線」。

(4) 阿扁戰略的北線架構：是以建立「美日台三方同盟」為立足點，把台灣劃分開來，東北亞地區是一個北線，下面是南線，北線主要是透過安全、民主和經濟「三個錨」，建立一個政治屬性較濃的「亞洲民主社群」。而陳水扁亦表達「美、日、台」的伙伴關係外，也可藉由強化亞洲民主國的關係，共同建立一個亞太民主社群。同時，美日台三方也應進一步調整對威權中國的投資和經貿政策，並期待透過美、日、台各國的調和及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共同加速建立亞太民主國家的經濟合作，將有助亞太地區安全的提升、民主的鞏固和經濟的繁榮。

(5) 阿扁戰略的南線架構：重提「南向政策」，希望把東協變成台灣經濟發展的「後院」，就像美國把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當成自己發展的後院，所以才有門羅

主義（孤立主義）的提出，意思是希望美洲的事務由美洲人自己管理，外人不得插手。因此，本質上這是屬於經濟性的意義。我們向東南亞地區擴張、經濟發展導向，而是要分散風險，不要讓台商一味地跑到大陸去投資。

就「南向政策」而言，它是從李登輝時代以來，一直被設定為台灣可以找尋經濟出路的地方。台灣雖小，但為了活絡經濟的發展，如果能夠把東協變成台灣的「後院」，雙方應能互蒙其利。因此，陳水扁政府在尋求突破兩岸關係正常化失利之後，重提「南向政策」，顯見台灣並沒有放棄把東協視作「後院」的觀念。

(6) 大溪會議的政經架構效用：台灣若突破中共的封鎖，為避免過度的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而遭到「磁吸」的效應，如果能有美、日、東協做為支柱，則可產生一股拉力，不致於被完全的「中國化」。相對的，如果戰略上能使用成功，台灣便可以居於亞太地區所構成的四方菱形中的核心位置。

伍、軍事安全戰略：建構台灣為「東方的以色列」

一、什麼是「東方以色列」

公元2000年，美國蘭德公司 (Rand) 三位研究員曾以「聯合整體狀況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 JICM)，透過電腦模擬台海衝突的情況，他們經過一千七百次的模擬過程中，發現中國在2005年前進攻台灣的任何企圖，都可能遭到慘重的傷亡，失敗的機會極大，這是第一次預測時間點；而今年的英國詹氏防衛週刊 (Jane's Defence

Weekly) 談到，如果2007年中國攻打台灣，則是採用斬首戰略，就像美國開始攻打伊拉克時，先發動飛彈攻擊轟炸巴格達（Baghdad），這是第二次預測的時間點。一般來講，預設戰爭的時間點，只有一種情況，必須是一個強權，而戰爭的主動力掌握在強權手上。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enry Rumsfeld）提出「三三三原則」——即美軍打一場戰爭，需要三十天的準備、三十天打完、三十天之後，馬上撤離去打第二場戰爭。結果阿富汗戰爭達到目的，而伊拉克戰爭在打的過程中也是達到，但是美軍要從伊拉克撤軍就沒有那麼容易，因為恐怖主義的關係，一年內可能還撤不了。

雖然如此，中國不願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提下，台灣必須保持強大的威懾力，這對維持台海和平是非常重要的原則。為了這個目的，蘭德公司的研究員曾建議美國應「按照以色列模式支援台灣軍事現代化」。他們認為：「多年來，美國一直是以色列主要的外部支持者，以色列的處境與台灣非常類似，都隨時面臨強大鄰國的進攻威脅。在軍售和軍援問題上，美國的政策是讓以色列在防禦作戰中保持相當程度的質量，以抵銷其數量劣勢。因此，美國對台援助也應遵循同樣的原則。」所謂「以色列模式」，主要有兩條途徑，一種是賣出武器，一種是軍事交流，美國現在也希望在這兩方面幫助台灣：（1）美國應支持台灣採購或研發能夠最大限度發揮其平台效力的武器、傳導感應器和其他裝備。包括高級中程空對空飛彈、先進空中監視雷達和現代化的防空指揮與控制系統、協助台灣空軍保護空軍基地等。目前決定戰爭勝利與否的要點，

不在於武器有多精密，而是偵察設備夠不夠精密。雖然我方有飛彈，可是沒有偵察能力，對方攻打過來就把飛彈基地摧毀，還能發揮什麼效用？因此預警、監視、偵察的雷達系統變得很重要。美國把預警、監視、偵察的雷達系統濃縮在神盾艦上，就可以做的到，只要我們有一艘神盾艦，中國就會害怕，因為神盾艦的偵察範圍，可以偵察整個中國大陸任何動向，台灣的防範能力增強之後，中國很難打贏台灣。

（2）協助台灣提高軍人的素質。例如，美國可以幫助台灣採購大量先進飛行模擬設備，或幫助台灣改進訓練計畫。另外，擴大美台軍事人員在軍事訓練領域的直接聯繫，以及擴大軍事交流的範圍等。

二、阿扁如何建構「東方以色列」

（一）建立「準軍事同盟」機制：加強美、台軍售與軍事交流，強化台灣反制中國犯台的能力。

加強向美國採購制空、制海及反登陸軍事裝備，並著重在構建C4ISR（指揮、管制、通訊、情報、電腦、監控及偵察）系統、發展資訊戰裝備和遠程精確打擊武器。其中C4ISR系統是發展航天偵察監視系統、海上神盾防空系統和空中預警系統，同時把三個系統綜合為一體化的指揮、控制、通信、情報、電腦、偵察和監視系統。再加上未來可能加入美國部署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TMD），台灣未來對解放軍的飛彈防禦能力，將大為增強。

另外，美、台雙方軍事交流已經低調進行多年，台灣三軍部隊都有派出龐大數量的人員在美軍基地或軍事學校受訓，而且敏感性較高的隸屬於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亞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所開辦

的行政主管課程，也在2002年5月首次接受了兩名台灣軍官參與該課程。再者，從美、台間的武器移轉與軍事交流的加強來看，美國首要目地無非是強化台灣反制中國可能以武力攻台的戰爭準備，讓台灣有能力成為「東方以色列」，並做為美國在「反恐時代」繼續在地緣上圍堵中國的重要前線基地。同樣的，陳水扁政府在「三芝會議」中主動支援美國反恐戰爭，並強烈宣示願意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也是主動配合美國的戰略規劃，重定台灣在美國圍堵戰線上的角色，就是回到舊的圍堵線裡面。

（二）建構防止台海衝突的戰爭準備，以防範中共軍隊的來襲。（決戰境外的戰略構想）

1、先制防禦、縱深打擊

台灣的戰略縱深很小，現在的戰鬥機速度也很快，三分鐘就可能從西部飛到東部太平洋，而中國大陸的戰略縱深太大，我們要拉大戰略縱深，就是要把戰場往外推，而不要侷限在台灣島內。因此，國軍應優先發展資訊能力，和遠距精確制導武器的研製與部署，藉由資訊優勢與台海制空權的掌握，加上遠距精確制導的打擊能力，平時能維持強大的嚇阻力量，戰時則能掌控先制性措施，拒敵於彼岸。

2、快速反應、決戰境外

對任何的中國來襲的情況，要有快速的反應，然後在境外（台澎金馬以外的地區）做決戰。當台灣在面臨武裝威脅，無法避免大規模軍事衝突時，主張應斷然使用武裝力量，採行快速而積極的軍事行動將敵軍毀於境外，摧毀於戰場縱深之後方基地，癱瘓其本土軍事目標。所以，美國賣武器系統多強化海軍、空軍的實力，而

不再強化陸軍的實力，如果台灣高科技武器之下制空權、制海權無法掌握時，其實不用經過地面決戰，勝負就已經差不多。

3、早期預警、聯合空防

要有監視偵察的系統，才能聯合空防（海陸聯合起來防空），這是最大的一個效應。建議應由現代電子及光學偵蒐裝備的運用，使早期預警情資與作戰部隊形成有機整合與運用，有效執行指揮與管制作戰。因此，國軍應研發部署長程預警雷達、無人偵察載具，並發展軍事偵察衛星，以提升早期預警能力，爭取反應時間。其次，在飛彈防禦系統的建構方面，除了考慮應採取外購或提昇現有裝備系統性能之外，基於國防自主原則，應在現有天弓二型防空飛彈系統的基礎上，能夠自行研發反戰術彈道飛彈系統（Anti-Tactical Ballistic Missile；ATBM），結合早期預警系統與攻勢作為，保障我方安全。

【Q & A】

學員：

美國國務卿貝克1991年提出扇形戰略，現在美國的全球戰略是否還維持一樣的情況？日本目前是自衛隊，本身並沒有軍事主導力量，為什麼要包括日本，南韓是不是被排除在外？四百多顆飛彈，聽說2006年或2008年會加倍，請問教授這對於未來台海兩岸軍事競備上的趨勢，可否做個解說？

王崑義教授：

剛才提到為什麼全球戰略構圖上會畫虛線，是因為在圍堵時期西方的歐洲和日本中間有一個蘇聯存在，故沒有辦法畫成實線，實線的意思是防衛線，實際上沒有辦

法來做聯結，只好想像可以聯結在一起。其實，這條想像戰線是毛澤東在1970年代決定要聯美制蘇時，所想像出來的「一條線」，意思是說西邊以次等發展資本主義的國家（指西歐等國家），高度發展當然指美國，另外還有日本，當時也是次等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因此，毛澤東認為次等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聯結在一起共同對抗蘇聯。

另外，因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蘇聯，美國對他來說就像是三國時代的東吳，是可以聯合來抗魏（蘇聯）的對象。嚴格說來，冷戰時期中國採取聯美抗蘇的戰略，所以有意配合美國的圍堵線；然後到九〇年冷戰結束以後，美國開始重新回來找尋新的假想敵——中國。因此美國提出新的政策，也就是圍堵線沒有變，只不過圍堵的對象變成中國，稱之為「新圍堵政策」。

至於，日本雖然是非軍事化國家，但是美日安保同盟，美國在日本部署一艘小鷹號（Kitty Hawk）的航空母艦，具備重要的軍力。為什麼南韓不是屬於美國圍堵線中重要的一環？因為南韓隨時面臨北韓的威脅，它是一個戰場而不是防衛線，日本防衛線是後衛地區。所以，雖然日本不能組成軍隊，但是日本的自衛隊，在美國的幫助及武裝之下，按照中國的軍力評估，全亞洲地區所有國家海上的力量，第一名是日本，第二名是印度，第三名是台灣。美國為什麼要武裝日本、暗中武裝台灣、武裝印度？中國過去在冷戰時期與印度打過一場中印戰爭，所以美國武裝印度是防衛印度洋；當然，武裝台灣也是避免中國勢力東出太平洋。而中國所有的武器設備最弱部分是海軍，中國打海上戰爭從來沒

有贏過，譬如元朝時三次征日結果失敗；1950年古寧頭戰役，鎩羽而歸，終於造成兩岸分裂的事實；1958年八二三砲戰，美國協防台灣並運補金門，造成美國可以干涉兩岸之間的一個定局。因此中國第三次不能隨意侵台，假設沒有打贏的把握，台灣獨立就可能成為事實。所以我認為2006年不可能發生戰爭，除非中國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打贏這場仗，否則不會輕易啟動這場戰爭。

再者，中國1995、1996年為什麼要用飛彈來測試？因為1958年八二三砲戰，造成美國可以干預兩岸之間發生的軍事問題，江澤民有意測試美國有沒有軍事上防衛台灣的決心？中國發射兩顆飛彈之後，美國把日本的小鷹號調過來台海地區，再從中東調一艘尼米茲（Nimitz）號航空母艦，以方便南北監視，中國於是停止飛彈試射，代表美國確實在軍事上有防衛台灣的決心。那麼中國第三次敢不敢打台灣？除非大陸有辦法摧毀美國的航空母艦，美國二艘航空母艦是在承平時期的，沒有在戰爭的時期裡，首次同時出現在台海區域，顯現美國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視。

由於我們國家小，而所面對的中國比台灣大很多，因此有些大陸學者就說，台灣最大的無奈是離中國太近，如果在四百哩以外，變成美國的一州是很理所當然，也不用擔心中國的武力威脅。但是，由於台灣所處的戰略位置很重要，美國要圍堵中國要協助台灣防衛中國，避免中國東出太平洋，只要中國的勢力有一個突破點，從台灣走出去時，太平洋是美國內海的局勢就會改變成公海，所以美國不可能放棄這個防守線——從日本、台灣，一直到菲律賓、東協，況且東亞國家又不穩定，於是

把重點放在澳洲，讓澳洲成為控制整個南太平洋的重心之地。由此可知，西歐、日本和澳洲是美國圍堵戰略的三隻大腳，其它地方還有美國的佈署，但是這些佈署裡面最脆弱的地區則是台灣，美國反而暗中支持。這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從戰略觀念上是可以預見的。

學員：

既然台灣對美國那麼重要，而台灣的地位在經濟上、戰略上，對其他國家應該也很重要。如果我們成為永久中立國，讓各國來防衛台灣，或者擁有像日本這樣的戰略地位，由美國來協防，台灣就不需要花費六千多億元買武器了。不知老師的看法如何？

王崑義教授：

台灣要成為永久中立國最大的難題是因為中國不會讓台灣成為永久中立國，中國一直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民進黨早期像施明德等人都曾提出「金馬撤軍論」，將金馬地區當成一個和平緩衝區的主張，但中國還是沒有辦法接受。剛才你提到說乾脆台灣不要有武力，直接讓美國來保護的主張，其實台灣有人在推動這個運動，國內有一個叫做五十一州（五十一俱樂部），就是推動台灣變成美國第五十一州，不過這些成員以外省族群為主。為什麼這些人一方面想做中國人，可是另一方面又想做美國人？我想是因為恐共症所使然，他們要做中國人是感情上無法割捨，但是如果中國真的打來，最想跑到美國去的我想一定是外省籍的朋友。我現在不是搞族群分裂，而是他們有恐共症與中國鬥爭的經驗，但是台灣人卻沒有。在現實上，要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很困難，中國連讓台灣做永久中立國都不可能接受

了，更何況是讓台灣成為美國的第二十一州，由美國直接來保護。既然台灣無法成為美國的一部分，也不能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就要做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需要擁有自己的防衛力量。本身沒有防衛力量就沒有安全，而沒有安全就沒有和平，所以花六千一百零八億元買軍購，無論是泛藍所說買安全的保障等等都無所謂，我認為這筆錢是有必要使用的。

有人問，台灣有必要花那麼多錢向美國買武器嗎？我想提醒各位，以往台灣商人到美國賺多少錢回來，六千多億元只不過是平衡一下雙邊的貿易而已，我們賺美國人購買電腦的錢，然後再去買他們的精良的武器，這只是經濟大循環中的一個循環，不要以為花了那麼多錢買武器都沒有用，用六千億元去跟美國買武器，也許那些電子精密系統都是台灣製造的，美國還需要向台灣下訂單，如此一來台灣的電子、科技才會發展。反之，我們千萬不要用一種保護自我的概念，只想要賺別人的錢，而不想讓別人賺我們的錢，這樣只有死路一條。

各位試想，你有錢去買別人的東西，別人會不會來買你的東西？譬如你是開咖啡廳，去買一件衣服，賣衣服的人賺到了錢，也會來喝你的咖啡，這叫做「互蒙其利」，自由經濟就是這樣循環的。購買武器也是如此，像早期七〇年代、八〇年代時，美國一天到晚派經貿談判團到台灣，與政府談論解決美台經濟逆差的議題，但是為什麼現在不用？因為美國找到一個出路——台灣賺美國的錢，然後花錢買美國的武器，可以達到平衡貿易的目的。

學員：

您剛才提到關於軍購的所謂「軍事自主

化」部分，據瞭解現在亞太安全中心預估2006年時台海的軍事平衡將會達到一個衝突點，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目前配套措施尚未完善提供之下，台灣統派和獨派的意識形態，目前台灣任何一個議題包括：安全、防衛、經濟等，都會提升到政治化的範疇，也就是關於愛不愛國、愛不愛台灣的情況，這是否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台海兩岸的平衡點？

王崑義教授：

我覺得台灣內部所謂的統獨之爭，無論是意識形態或是什麼，並沒有那麼嚴重。因為藍綠之間的統獨意識，都是雙方權利之爭所演化出來的結果，並沒有其必然性。按照李友會所公布的民調資料，真正堅定獨立意志的只有百分之三點三，大部分人接受統或獨的決定，只要人民願意投票，由公投結果來決定，是統就接受統、是獨就接受獨。既然政治版圖是如此，政治人物跳來跳去，不過是玩政治遊戲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看，為什麼藍綠之間對安全及各種議題都不同？權利之爭，總要找一些議題，尤其現在是媒體的時代，創造自己的價值或曝光率。泛藍三二〇抗爭，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跳出來，就知道這些人年底準備選舉，意圖營造其曝光度。真正有理念、堅持行動的人是不需要曝光，也不需要媒體面前造勢，像各位看不到我在媒體上造勢，因為我是很堅持自己的理念，有些時候也不太堅持而常常上媒體，在媒體上與非媒體時代所講的話，不見得完全相同，但立場是一致的。

學員：

如果有一天台灣和大陸統一，對太平洋周圍各國的國際情勢的影響是如何？

王崑義教授：

我認為如果真的有一天台灣會與中國統一，一定有一個前提，就是大陸民主化，這樣王子與公主結婚後，才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我相信中國還是一個極權體制政權時，台灣與中國絕對不會統一。事實上，泛藍恐共症比民進黨還嚴重，今天雖然喊統一，真的要統一的時候，他第一個反對。也許有些泛藍的人會說我支持兩岸統一，但是等中共民主化以後再說。如果中國是民主化，像美國這樣有制度的國家，不要說台灣要與中國統一，就算台灣要獨立，中國也不會反對，就像台灣對俄羅斯而言，台灣的獨立或與中國統一，對俄羅斯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台灣是民主國家，如果中國也是民主國家，大家合在一起是互蒙其利，多一塊地或少一塊地都沒有用。民主國家間很多是互通的，台灣獨立只不過是幫他守護東方的一個海疆，在邊緣的一個彈丸之島。因為觀念會隨著時代而改變，等到中國真正民主化之後，很多觀念就會改變。

不要去想像未來五十年、一百年中國的變化，或是中國會不會民主化的問題，而是要想像台灣如何維持現狀——維持台灣在一個安全、和平的環境，該如何做？當台灣依靠自己的力量而無法防衛本身安全時，當然要聯合周邊的國家一起來防衛，因為這是一個共同安全的時代。如果台灣今天都過不了，還想著明天做什麼？我認為陳水扁政府是採取比較務實的態度，看待兩岸關係，比泛藍的作夢式的兩岸政策更務實，對中國而言，他可以隨著泛藍去做夢，感覺大家都在做夢，等到五十年、一百年後再來解決，這是鄧小平說的。當中國碰到民進黨提出這麼清醒的大

陸政策，中國卻不知道該如何因應，只好聽其言觀其行，慢慢去摸索，到底民進黨在玩真還是玩假的？目前兩岸的關係就是這種狀態，可以做夢但是無法實現時，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辦，特別是中國，才會僵在那邊，講一些理由然後拖拖拉拉。大家仍然希望在現實裡找出一條可循之路，但還沒有找出來時，就僵在那邊。

兩岸發生戰爭不是只有我們付出代價，他們付出的代價更多。有一位中國軍科院的將領彭光謙，有一次在軍事研討會時，提出「犯台七個代價」。2001年我就跟他討論過這個議題，當時比較鷹派的軍官說不惜打台灣。我一個個抽絲剝繭解釋說，你們所講的代價都低估了戰爭的代價，即使是七個代價都是小代價，加在一起就成為一個大的代價，中國承受得起嗎？所以不能將代價分開來看的。現在很多中國軍人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戰爭的代價細分化，認為每一方面都損失一點沒有關係，可是如果串連在一起就形成一個大的衝突引爆點、是一個全面性戰爭的時候，中國要怎麼辦？我相信等他們比較清醒考慮到，兩岸衝突不是局部性的戰爭，可能引發全面性的戰爭，包含東北、西北、台海之間都牽連在一起。東北是因為北韓會伺機蠢動，北韓軍隊南下，北韓難民就上去；西北的新疆分離主義就會跳出來，大陸馬上面臨台海之間是高科技戰爭，在東北地區是陸空零和的傳統戰爭，可是西北又要面臨恐怖主義的特種戰爭，三種不同類型的戰爭，亦即是三個世代不同的戰爭同時發生在中國時，中國政府該如何因應這些戰爭？因此，我們談戰爭的代價，不是只有一點一點的分割，而是整體包括全面性時，中國應如何去因應這些問題。我

相信這個東西就是牽制中國不敢在台海隨便動武一個最大的關鍵點，而不是在美國、也不是在日本的一個軍事力量有多大的問題；再者，這些東西也不僅是民主主義就能解決的，而是一個很現實面的問題。

總之，任何戰爭發生前很多都是充滿想像的，真的發生戰爭之後，從過去傳統戰爭發生的例子裡，才會發現過去的想像是不對的，反而是要趕快再往前走，去創造新的戰爭理論或戰略理論出來。現在所想像的，如同剛才預設了很多像2005、2006、2007年會發生什麼戰爭，這些都是想像的，真的實實在在發生戰爭時，又有新的戰爭與戰略觀念來因應。

學員：

請王教授用戰略的觀念來解釋，泛藍主張三通，還有商業要開放、一些產業出走等經濟面的發展，又兩岸現況會維持現狀多久？會不會走到一段時間之後，雙方必須攤牌，不管是統一或是獨立，用軍事或用談判來解決？阿扁總統又如何處理台海兩岸的事務，以塑造他的歷史地位？

王崑義教授：

我想阿扁能夠塑造自己的歷史地位，不是宣佈台灣獨立，而是跑到中國大陸去跟胡錦濤握手言和，共得諾貝爾和平獎。我和政大國關中心李明峻研究員去中國南大客座時，聽到他在課堂上也是這麼講。基本上，如何維繫兩岸的和平，而不是發生戰爭，才是陳水扁總統所應尋求的歷史地位。

至於兩岸三通的經濟問題，誰最怕三通？上海最怕三通，因為如果兩岸不三通，所有的貨物全部都要到上海，因為上海是長江支流黃浦江的一個港口，輪船是

進不去，都要在黃浦江口卸貨然後再輾轉送進中國內陸。因此，孫中山先生才會想把舟山島建立成為一個東方大港，可是目前舟山島一天到晚都在演習根本建不起來。如果真的兩岸三通時，高雄港馬上會取代上海及香港的地位，因為高雄的位置剛好在中國兩大發展區域——長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中間。

第二個最不喜歡三通的是中華航空公司，因為都是用七四七的客機，班班從香港台北往返都是客滿，假使兩岸三通之後，這些飛機怎麼辦？譬如飛台北上海，可是每一趟載客量要很多人，一下子擠滿不太可能，因為它是總體的從台北運到香港，然後香港轉運到各地去；但是從香港到大陸內地很多大陸航空公司，是普通的七三七飛機座位很少，而華航是廣體客機座位很多。因此我們堅持的是，兩岸三通一定要變成國際航線，大陸則堅持要國內航線，為什麼？因為大陸要保護不僅是政

治上的利益，還有經濟上的利益。如果中國自己航空公司的市場有限，當其他國籍的航空公司也加入的時候，外籍航空公司競爭力一定強過中國的航空公司，而中國大陸的飛機就沒有人坐。三通本身是一個政治動作，但是背後經濟利益的角逐是相當大，才會一直僵持著。至於兩岸現狀維持多久，其實很難去預估。譬如十年後大陸會民主化，我跟你講一些理由你相信了，可是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不太可能，所以告訴各位不要去做夢，目前務實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是最實在，未來兩岸會變成什麼？我還是比較堅持站在台灣派的立場。有時去大陸會想到，為什麼有那麼多台灣人前到中國發展？統一對我們並沒有好處。

（本講座內容發表於2004年7月13日，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由陳雪琴、蘇芳誼紀錄整理）